

抗日战争时期 解放区高等教育

曲士培

北京大学出版社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LIBERATED
AREAS IN THE PERIOD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1937.7—1945.9)

QU SHIPEI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高等教育

曲士培

责任编辑：张晓秦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5印张 147千字

1985年3月第一版 1985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统一书号：7209·4 定价：1.35元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抗战时期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	(1)
一、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 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	(1)
二、实行文化教育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政策	(4)
三、坚持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	(7)
四、毛泽东论新民主主义教育	(9)
第二章 抗战时期解放区高等教育发展的三个阶段	(17)
一、大发展阶段	(17)
二、大整顿阶段	(20)
三、大提高阶段	(25)
第三章 抗日军政大学	(29)
一、第一期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	
抗日红军大学诞生	(29)
二、第二期 适应抗战需要	
抗大公开招生	(32)
三、第三期 确定教育方针	
发挥创造能力	(35)
四、第四期 学校规模大发展	
民主精神大发扬	(37)
五、第五期 全校工作大检查	
总校东征晋察冀	(43)
六、第六期 粉碎日寇进攻	
坚持敌后办学	(53)

七、第七期 认真总结经验	
发展教育事业	(56)
八、第八期 积极准备反攻力量	
抗大总校返回陕北	(59)
九、抗大分校	(63)
第四章 陕北公学	(71)
一、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成长	(71)
二、教育方针和教育内容	(73)
三、教学原则和学习方法	(74)
四、革命的校风——忠诚、团结、紧张、活泼	(76)
五、陕北公学分校	(78)
第五章 鲁迅艺术文学院	(81)
一、成立经过	(81)
二、初创时期	(83)
三、从改制到改编	(87)
四、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下前进	(89)
五、朱德对鲁艺的殷切期望	(92)
六、向“正规化”和“专门化”的方向发展	(94)
七、在整风运动中总结经验教训	(99)
八、沿着党的文艺路线继续前进	(106)
九、文艺教育史上的光辉篇章	(109)
第六章 延安大学	(115)
一、初期概况	(115)
二、整风后的组织调整	(117)
三、关于教育方针、学制和课程	(121)
四、关于教学方法	(124)
五、关于教员和学员的基本情况	(126)
六、发扬民主精神 开展生产运动	(135)
七、响应党的号召 为完成新的历史任务而奋斗	(136)

第七章 中共中央党校及其他院校	(141)
一、中共中央党校	(141)
二、华北联合大学	(142)
三、中国女子大学	(146)
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	(148)
五、中国医科大学	(148)
六、自然科学院	(150)
七、军事学院	(151)
八、民族学院	(151)
第八章 办学的若干经验	(154)
一、关于教育原则	(154)
二、关于教育计划	(159)
三、关于教学方法	(163)
四、关于政治工作	(170)
结束语	(181)

第一章 抗战时期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

一、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 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出兵占领我国东北三省。以后数年，它贪得无厌，得寸进尺，利用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逐步侵入华北，并加紧策划，妄图一举侵占全中国。正当我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中央于1937年5月在延安召集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深刻地分析了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的变化，指出：“中国的救亡抗战，必须用跑步的速度去准备。”^[1]并明确地提出：“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教育上的国防准备，都是救亡抗战的必需条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缓的。”^[2]毛泽东把教育上的国防准备，当作救亡抗战的必需条件之一。这不仅强调了教育事业在抗日时期的重要地位和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且规定了教育必须为抗战服务这个基本的方针。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又作了题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任务，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3]为了准备抗日，必须培养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成千成万的优秀干部。这就给全党提出了一个急需发展干部教育的艰巨任务。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芦沟桥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号召全民抗战。7月23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提出实施“国防教育。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不急之务和不合理的

办法，一概废弃。”^[4]8月25日，中共中央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中第八项规定“抗日的教育政策：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5]这是解放区实行抗战教育的总政策。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广州、武汉以后，抗战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的巨大发展，迫使敌人停止了正面战场的进攻，而将其主要力量转向敌后战场，加紧进攻解放区。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党在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举行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地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并规定了全国人民在抗战中的紧急任务。在文化教育方面，毛泽东提出：“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他说：“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因此全民族的第十个任务，在于实行如下各项的文化教育政策。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第二，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关于抗战教育的实施问题，他又指出：“抗战以来，教育制度已在变化中，尤其战区有了显著的改进。但至今还没有整个制度适应抗战需要的变化，这种情形是不好的。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二者间的不配合现象亟应免除。”^[6]

六届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实行国防教育政策，使教育为民族自卫战争服务》的决议。

为了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党中央和毛泽东一贯主张实行抗日的教育政策，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这个正确的教育方针和政策，受到了广大的教育工作者的热烈拥护和支持，并在解放区得到了认真的贯彻和执行。

陕甘宁边区首先实行了党的国防教育的政策。在1939年1月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讨论并提出了实施国防教育的具体办法和要求。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工作报告中指出：“边区实行国防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人民文化政治水平，加强人民的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使人民自愿的积极的为抗战建国事业而奋斗；培养抗战干部，供给抗战各方面的需要；教育新后代，使成为将来新中国的优良建设者。”^[7]边区实施国防教育，虽然由于物质条件的困难而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在全国范围内，边区却是第一个真正实行了国防教育，使教育成为抗战的一个有力的武器。当时设在延安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文学院等高等学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创造了丰富的经验，不仅对其他解放区的教育建设起了示范作用，而且在全国也是独树一帜的。

华北、华中各解放区也都根据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大力开展教育事业。例如，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在《晋察冀边区施政纲领》中规定“在提高国民文化水准及民族觉悟的目标下”，发展各级学校教育，其中特别指出：“建立并改进大学及专门学校，加强自然科学教育，优待科学家及专门学者。”由于抗战和建设事业的需要，当时已经相当重视发展自然科学教育，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同时，还注意争取和团结科学家及专门学者，并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

抗战时期，解放区各级各类学校遵照党的指示，不仅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而且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将生产劳动正式列入教育计划。党和毛泽东经常号召和赞扬广大师生参加生产劳动。例如，1939年，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称赞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的青年学生学习革命理论，参加生产劳动，是抗日救国的先锋。1943年，毛泽东在《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一文中，又号召广大师生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他说：“一切机关学校部队，必须于战争条件下厉行

种菜、养猪、打柴、烧炭、发展手工业和部分种粮。”他又说：“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都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本领。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一切军民人等凡不注意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8]广大师生通过生产劳动，创造了物质财富，克服了当时办学的物质困难，增强了劳动观念，提高了思想觉悟。

解放区的教育事业，在党的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方针指引下，不断发展，阔步前进。

二、实行文化教育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政策

抗战时期，党在解放区的文化教育工作中实行了统一战线的政策，对知识分子进行了团结、教育和改造，推动了文化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

为什么要在文化教育工作中实行统一战线的政策呢？毛泽东于1944年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所作的讲演中曾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解放区的文化已经有了它的进步的方面，但是还有它的落后的方面。解放区已有人民的新文化，但是还有广大的封建遗迹。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文盲，两千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这些都是群众脑子里的敌人。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为了进行这个斗争，不能不有广泛的统一战线。而在陕甘宁边区这样人口稀少、交通不便、原有文化水平很低的地方，加上在战争期间，这种统一战线就尤其要广泛。”^[9]毛泽东具体地、历史地分析了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的现状，既肯定了进步的方面，又指出了落后的方面。为了改变边区文化教育落后的面貌，他从实际出发，提出了实行统一战线的政策。这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在战争条件下，边

区政府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有限，如果不在文教战线上组织广泛的统一战线，就不可能战胜“群众脑子里的敌人”，也不可能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文化教育运动，当然也就不可能加速发展解放区的文化教育事业。毛泽东实事求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刻地论述了在文化教育工作中实行统一战线政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一步提高了全党和广大文教工作者的认识，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采取多种形式办学，使解放区的文化教育工作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怎样实行文化教育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政策呢？毛泽东说：“统一战线的原则有两个：第一个是团结，第二个是批评、教育和改造。”在实行过程中，既要反对那种无原则的迁就、姑息和妥协的做法，又要反对采取排挤、鄙视和厌恶的态度。因此，毛泽东说：“在统一战线中，投降主义是错误的，对别人采取排斥和鄙弃态度的宗派主义也是错误的。”正确的做法，就是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只要我们做得恰当，他们是会欢迎我们的帮助的。”^[10]毛泽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从我国革命和广大知识分子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对于扩大统一战线，加强解放区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建设和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抗日战争时期，党和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问题一直是很重视的，经常提醒全党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放手地任用和提拔他们。例如，1939年，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写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1]他还指示：“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

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只要是愿意抗日的比较忠实的比较能吃苦耐劳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多方吸收，加以教育，使他们在战争中在工作中去磨练，使他们为军队、为政府、为群众服务，并按照具体情况将具备了入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入党。”^[12] 1940年，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的指示《论政策》中指出：“关于文化教育政策。应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的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应吸收一切较有抗日积极性的知识分子进我们办的学校，加以短期训练，令其参加军队工作、政府工作和社会工作；应该放手地吸收、放手地任用和放手地提拔他们。不要畏首畏尾，惧怕反动分子混进来。这样的分子不可避免地要混进一些来，在学习中，在工作中，再加洗刷不迟。”^[13]

党和毛泽东在提出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同时，还强调对知识分子要进行教育和改造，要彻底解决立场、态度和为什么人的问题，也就是要知识分子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满腔热情地为人民大众服务，实行和工农相结合。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正如毛泽东所说的：“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14] 怎样才能彻底地解决这个根本的问题呢？这就要求知识分子“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15]

解放区的党、政、军各部门根据党的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大量地吸收了知识分子，团结他们共同工作，教育并带领他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克服他们的缺点，使他们革命化和群众化，从而扩大了文化教育工作中的统一战线，加强了文化教育方面的力量，推动了解放区文化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

三、坚持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

毛泽东一贯重视党对文化教育工作的领导。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进一步从理论上、方针政策上和管理体制上解决了党对文化教育工作的领导权的问题。

在理论上，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这一光辉的著作中指出：“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16]“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17]这个科学的论断，奠定了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文化教育工作的理论基础。

在方针政策上，毛泽东提出的“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实行“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等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团结了广大的文教工作者和各种知识分子。他们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实际斗争的锻炼，克服缺点，逐步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

在管理体制上，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并实行了党的一元化的领导体制。1941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明确规定各校分别属于中央各有关部门来领导，如延大、鲁艺、自然科学院直属中央文委。并由中央宣传部对各校课程、教员、教材及经费，协同各主管机关进行统一的计划、检查与督促。解放区各级各类学校都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蓬勃发展起来的。

群众路线，是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毛泽东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

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18]由此可见，党的群众路线，一方面要求在工作中，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另一方面要求领导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关于在教育工作中如何贯彻群众路线的问题，党和毛泽东当时作过许多重要的指示。在思想认识上，文教工作者要明确文教工作的目的和意义。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19]这就是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我们文教工作者的出发点。在教育建设中，毛泽东强调要根据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他说：“这里是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

“在一切工作中都是如此；在改造群众思想的文化教育工作中尤其是如此。”^[20]这就是说，在发展群众性的文化教育事业中，要从实际出发，按照群众的工作和斗争、生产和生活 的实际需要，在群众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开展教学工作，发展教育事业，不要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而盲目行动。在学校管理中，各校遵照党的指示精神，充分发扬民主，注意调动广大师生的积极性。学校领导经常采取各种形式，倾听师生的意见，集中群众的智慧，总结经验，改进工作。许多学校还规定教师和学生的代表参加校务会，共同商讨管理学校的大事。在教员工作中，提倡教员在教学中要向学生学习，要经常了解学生的思想、经验、情绪和要求，不断地改进自己的工作。毛泽东根据当时学员和教员的实际情况，曾经提出：教员应向学生学七分，然后教三分。^[21]这是在教学上发扬民主精神的一种表现。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的广大教育工作者，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定不移地依靠党的领导，自始至终地贯彻群众路线，克服了各种困难，创造了多种学习形式，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各级各类学校如雨后春笋似地出现，解放区的教育事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四、毛泽东论新民主主义教育

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这是一部战斗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在这部光辉的著作中，毛泽东科学地总结了近百年来中国革命的经验，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在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上，驳斥了资产阶级顽固派的谬论；批判了“左”、右倾的错误思想，系统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纲领，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根本问题，扫清了思想界的迷雾，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斗争精神。在文化方面，毛泽东论述了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划清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和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文化的界限；批判了五四文化运动以来在文化性质问题上的偏向；规定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和内容；指明了中国文化革命的光辉前途，为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还详尽地论述了新文化发展中的指导思想、批判继承、统一战线等基本问题。毛泽东在这部著作中所讲的文化问题是广义的，它包括教育问题在内，关于文化问题的观点，也适用于教育问题。因此，这部著作是我们学习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教育理论的主要著作。由于其内容极为丰富，这里仅对其中几个主要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关于文化教育和政治经济的关系：怎样认识文化教育，怎样认识文化教育发展变化的客观依据，这是我们研究文化教育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毛泽东依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这

个问题作了高度概括的说明，他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22]这就是毛泽东要我们在研究文化教育以及认识文化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时，所应持的基本观点。

根据这个基本观点，毛泽东指明：“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東西”；“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

“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23]这一科学的论断，有力地批驳了当时资产阶级文教工作者所大肆宣扬的文化教育可以“超阶级”、“超政治”的谬论。

根据这个基本观点，毛泽东又进一步指明：“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24]毛泽东不仅指出了新文化教育与反动文化教育之间的尖锐矛盾和生死斗争，而且号召广大进步文教工作者团结起来，打倒反动文化教育，建立和发展新文化教育。

根据这个基本观点，毛泽东还强调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25]由此可见，革命的文化教育在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要。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极大地提高了解放区的广大文教工作者对于革命的文化教育意义的认识；鼓舞着他们在抗战的烽火中，深入广大群众，广泛开展文化教育活动；指引着他们把文化教育“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26]

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和旧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界限：划清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和旧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界限，不仅是为了解决一般的认识上的问题，而且是涉及正确理解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领导权的问题。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五四前后的历史情况并明确指出：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当时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可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入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27]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28]由于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主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29]

毛泽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当时的历史事实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划清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和旧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界限；解决了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运动究竟是谁领导的重大问题，批驳了资产阶级文教工作者妄图否认无产阶级对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作用的无稽之谈。

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性质：毛泽东当时指出：“在现阶段革命的基本任务主要地是反对外国的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不是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

标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所以当时整个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情况，还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新民主主义的。毛泽东又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因此，“当作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思想”，“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为了夺取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坚持向广大干部和群众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长期的重要任务。

虽然如此，但整个的国民文化，当时也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因为就整个社会来说，当时还没有形成整个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所以还不能有整个的社会主义的国民文化。为了防止在文化教育上发生偏向，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把二者混为一谈，无疑是很不适当的。”^[30]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根据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性质，纠正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文化教育性质上发生的“左”的错误，使解放区的文化教育工作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指导下不断前进。

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内容：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毛泽东指出：“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31]